

絲路上的文學遺珍

為何荒漠有奇葩？

漢武帝是一位英武有為的皇帝，開疆拓土，設置酒泉，張掖，武威，敦煌等諸郡，移徙軍民屯墾，東西交通的絲路暢通。這樣，定居在那裡的人民，接受了西域文化，很多崇奉進口的佛教，也懷念固有的文化，從第二世紀以後，漸漸形成荒漠的特有文化。

甘肅敦煌縣東南，有鳴沙山，山麓有三界寺，寺旁有許多石窟，因為壁上有許多佛像，所以俗稱千佛洞。清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在進行修理的時候，清除堆積的沙礫，發現在複壁的後面，另有一間是藏書庫，裡面有書籍，碑版，佛經，唐人手抄本，及其他美術品甚多，約有五萬件，為四至十世紀時的文物。這就是莫高窟的敦煌遺書，原來是西夏兵革時保存在那裡的。

到了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英國人斯坦（M. Aurel Stein）到那裡收了三十多箱，運回國陳列在倫敦大英博物館，其中包括手寫本，繪畫，繡件等。法國人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也來收了千多卷，運到巴黎國民圖書館。遲至1930年，當時的中國政府才注意到這件事，搜求剩餘的非精品，運存在北京圖書館。

國人學者，得到伯希和允許，影印了敦煌遺書，才得以開始了“敦煌學”的研究。

殘卷中的詩文

敦煌的文物，涵括非常豐富。其中的佛像繪畫，影響了藝術的發展；手錄的殘卷，有從第四世紀至第十世紀，保存在那裡，發現以後，影響中國文學更為深遠。

原來文字是語言的記錄。文字最初發展的過程中，是與語言相近的；只是文字的特性是要求有規律，而且刻畫書寫的文字，總不像說話那麼方便，所以必須簡略。人是活的，語言文字也都是活的東西，必然會改變。這樣，許多年之後，當時記錄的文字，不是後代會說話的人都能夠了解的，也就是發生了差距；只有專研究文字的人，才可以充分了解那些記錄。也就是說，有部分的人，不能自己看那些符號了。

例如：詩經的大部分，是收集各地的民歌，當時自然是淺白易懂。過了許多年以後，就不那麼容易懂了。這樣，本來是傳通思想的文字，其本身就需要傳通。

佛教於漢明帝傳入中國後，最初的譯經者，是天竺（印度）僧人竺法蘭；其後，有月氏僧竺法護，天竺僧鳩羅摩什等翻譯家，相繼譯佛經多卷。

不過，佛教歷代有帝王支持，所翻譯佛經，就是翻譯，仍然不是一般人的語言，更不是當時各低階層的普羅大眾所能了解的。為了這個緣故，必須有傳播的方法，深入基層。“變文”就是在這樣需要下產生的。

所謂“變文”，就是改變的文體：由散文(道白)變韻文，由韻文(唱詞)變散文；散文容易明白，韻文容易記，傳通的目的就達到了。

在古時的荒漠邊地，沒有甚麼娛樂，變文成為排遣時間的方法，自然受到歡迎。敦煌變文以“押座文”開始，要聽眾肅靜專心聽；以“解座文”收尾，就是散場；中間講唱互變，生動有味，時加詼諧笑談，頗為平民化。其內容，有宣揚佛經教義，如：破魔變，降魔變，大目連冥間救母變等，多講今生來世因緣故事；還有民間流傳的故事，歷史人物，如：伍子胥變文，李陵變文，王昭君變文等。這些講唱，與古希臘荷馬史詩相似，有成套的詞組術語，容易記憶流傳。所用的道具簡單，一張桌子，一塊“醒木”，是在說的時候，加重語氣，拍下去作聲，有叫聽眾保持清醒的效果。

變文能雅俗共賞，也進入宮廷。在高力士外傳載：“上元元年太上皇與高公...講經，論議，轉變，說話...”。“上元”是唐肅宗的年號（760年），安史之亂後還都，玄宗成為太上皇，有時聽聽“轉變”，就是講唱變文消遣，“冀悅聖情”。

這種說書的藝術，進入宋朝，更降而流行民間，到二十世紀初年，還能夠見到，沒有多大改變，只是內容增加很多。

在敦煌殘卷中，也發現王梵志佚失已久的詩作三百首。其詩如同口語，但不乏深義：

吾有十畝田 種在南山坡
青松四五樹 綠豆兩三窠
熱即池中浴 涼便岸上歌
遨遊自取足 誰能奈我何

可見通俗原不一定俚俗。這裡所表現的，是知足樂天的農耕鄉居生活，與古老的“康衢老人”頗為相類：“帝力何有於我哉！”“多麼可羨慕。

唐代還有個詩僧寒山，或稱寒山子，與另一個半癲詩僧拾得，相識相伴。張繼“宿楓橋詩”的名句：“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”，對一般人來說，比寒山更有名；也許，因此使寒山知名也不一定。

寒山子集中，有一首詩：

有個王秀才 笑我詩多失
云不識蜂腰 也不會鶴膝
平側不解壓 凡言取次出
我笑你作詩 如盲徒詠日

在這裡，寒山說他自己作詩純出自然，不著意格律，更不取“蜂腰”，“鶴膝”的過分離琢，甚且忽略平仄，用語體作詩，不失其天然之美。這是從詩的格律，說到美學，並討論文學的價值觀了。

他另外有一首詩，看來淺薄，卻是嚴肅的講價值問題：

東家一老婆 富來三五年
昔日貧於我 今笑我無錢
渠笑我在後 我笑渠在前
相笑儻不止 東邊復西邊

這是說一個暴發戶的富婆，只知道順應“向錢看”標準，瞧不起無錢的人。當然，無錢並不一定是貧窮。詩人說：想當年我也愛錢，誇富，看不起你那時的光景。到現在“知今是而昨非”了。也許，這首詩所說的，非常現代化呢！

王安石的詩蒼老古拙，還可算作拗，卻似乎是很景慕那兩名詩僧。有一天，王安石要去早朝，在出門的時候，大風把簷瓦吹落，打破了他的頭，他就作了一首詩。也許，可說是機緣吧，那成為他最為人知的詩，還頗含禪味：

擬寒山拾得十九首之四(王文公文集卷五十)

風吹瓦墮屋 正打破我頭 瓦亦自破碎 豈但我血流
我終不讀渠 此瓦不自由 眾生造眾惡 亦有一機抽
渠不知此機 故自認愆尤 此但可哀憐 勸令真正修
豈可自迷悶 與渠作冤仇

白居易的詩和歌，已經夠淺白了，至少比今天的甚麼謎一般的“現代詩”，容易懂得多了。看來白話文是在開倒車，像寒山所譏笑的，“如盲徒詠日”。問題出在哪裡？是經驗和觀念的事。生下來眼睛就沒見過太陽，無論如何給他補腦，也無補於實際，總是言之無物。

變文的流行，與唐以後的詩文口語化，不能說沒有關係；但影響深廣到甚麼程度，就很難一權衡了。不過，事實是從那時起，在文人的詞彙中，出現了淺白的佛教語句，加上了“禪機”；不獨王摩詰（維）如此，王安石如此，特別是宋明的理

學家，更為普遍了。他們的文章，詩句，白話的痕跡是十分顯然的；甚至論者說：“宋儒非儒”。

中國的白話文運動，對這一代的人來說，似乎是遠古的歷史。更有一項誤會，以為那是一群學者，坐在書房裡憑靈感想出來的；或是在 1919 年，留學生從外洋進口的。也有人以為是趙元任先生的主張：“話怎樣說，就怎樣寫。”於是全國遵命效法，白話文就產生了。

其實，白話文存在於中國社會，少說也已經一千年了。其重要的成分，與佛教的宣揚有很大關係。現在打開辭源，辭海主類的辭書，就可以發現有那麼多的佛教語，連基督教的聖經中，也有“世界”，“慈悲”等語詞。而 1919 年，剛好也是和合譯本聖經出版的一年，其文字的簡練，精嚴，超越，還沒有任何書籍可以相比；基督教所使用的語詞，“祝福”，“代罪羔羊”，以至“十字架”，也出現在一般文學作品中。

在重傳播的時代，文字不僅要看詞藻，形式，更在乎思想和內涵，到底是說些甚麼，給讀的人甚麼方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